

壹、前言

近來社會漸趨M型化，城鄉差距拉大，爲了鼓勵優秀學子留在社區高中就學，以實現「照顧弱勢、區域平衡」的理念，教育部於2007年開辦大學繁星計畫，由「頂尖大學」及「教學卓越」的25所大學開設名額，期使全國各高中具有潛力之學生均有就讀優質大學之機會。針對此一新興重大政策，社會普遍給予高度肯定，因爲其中117所高中近三年來首次有學生（162名）進入頂尖大學（蔡閨秀，2008）。這些優秀的社區高中學生，在校成績均名列前茅，但他們原本可能無緣進入頂尖大學，如今進入頂尖大學後是否會學習適應不良、跟不上別的優秀學生，而產生學習的落差？值得進一步探討。本研究即針對進入一所頂尖大學（國立台灣大學）的繁星計畫學生進行研究，探究其學習經驗與成效（課業成績）。由於該校爲國內指標性大學，在學校聲望與新生錄取分數上均名列前茅，因此，瞭解進入該校的繁星計畫學生在此一追求卓越、高度競爭的環境中，究竟在課業上的學習適應與學習表現如何，在政策評估與學生輔導上具有先驅性實徵研究的指標性意義。以下將先針對相關文獻，包括區域資源落差、繁星計畫沿革與弱勢學生學習狀況等進行探討，其次呈現研究樣本、方法與研究結果，最後則針對結果進行討論，並提出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一、從區域落差至平衡資源發展：從「明星高中」至「高中均質化」的政策發展

區域發展與資源的差異，造成了教育機會的城鄉差距（張淑美，1994；教育部，2009；郭明堂與羅瑞玉，1995；陳奕奇與劉子銘，2008；黃毅志，1990），此一發現，國內外研究皆然。邱玉蟾（2003）指出，美國不同學區學校在學校環境、師資設備、教學品質與教學支援之差異很大，造成學生學習表現上的差距。究其原因在於教育經費來自地方財源，因此，不同地區家庭社經背景的落差造成了教育品質與學生學習表現的落差（Wenglinsky, 1997）。國內研究也發現，社經背景的差異是城鄉學生學習表現差距的來源（巫有鑑，1999；李秀如與王德睦，2007），而且城鄉差距確實導致學生學習表現上的落差（吳清山與高家斌，2005；教育部，2007；楊思偉，2006）。郭明堂與羅瑞玉（1995）指出，都市學校軟硬體皆較鄉村學校佳；亦有研究顯示，都會區學校學生學習成果較佳（李鴻章，2006；Sirin,

2005)。駱明慶（2002，2004）也發現，都會區學生確實具有上大學的優勢，且即使在過去的台北縣內，鄉鎮間也有顯著差異。蔡閨秀（2008）指出，在繁星計畫施行前三年，117所社區高中沒有學生進入頂尖大學，此凸顯出區域間的不均衡，社區高中學生沒有機會進入頂尖大學。

過去大學稀少，學生爲了未來能擁有好的出路，需在高中聯考中名列前茅，考入明星高中，因爲如此等於握有進大學的保證，所以造成國中生爭先擠進明星高中，甚至跨區就讀的現象。再加上明星高中大多位於都會首善區域，致使原有的城鄉差距更爲惡化。近十幾年來，由於廣設高中、大學，加上少子化趨勢，大學錄取率從1970年的20%~30%到目前已近乎百分之百（教育部，2010a）。雖然人人可以念大學，卻也造成大學文憑應聲貶值的現象。在此一趨勢之下，學子們更加爭取擠入「頂尖大學」名校的機會，升學壓力依舊不減，明星高中始終屹立不搖。駱明慶（2002）針對台大學生調查發現，82%的台大學生來自前20所明星高中，且居住在五大主要都會區者進入台大的機會愈大。王秀槐（2010）也發現，2008學年度台大學生有三分之二集中在14所明星高中，且主要集中在五大主要都會區。明星高中在都會區的高度集中，造成偏遠地區優秀學子跨區就讀，使城鄉的差距擴大，形成惡性循環。爲降低明星高中集中程度，教育部開始推動高中職「均質化」與「優質化」政策，以挹注資源、鼓勵就近入學等措施，期使各地高中均質化。

同時，由於目前國內後期中等教育質量發展均已趨近準義務化的水準，因此，教育當局也開始積極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以改善明星／非明星學校、高中／高職、城市／鄉村各方面的落差，降低升學壓力，導引國中教學正常化（張鈿富與吳舒靜，2008；莊玉鈴與秦夢群，2010；楊思偉，2006）。然而，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難處在於明星高中的觀念根深蒂固，特別是在都會首善區域。田振榮、宋修德、陳信正、牛涵釗與杜肇申（2006）發現，在2004學年度，45個適性學習社區的高中就近入學率中，90%以上的爲花東外島地區，低於40%以下者皆在台北、高雄等都會區。可見都會區就近入學率相對爲低，社區高中的推動成效有限。因此，爲使高中均質化，除了補助資源，使大多數高中優質化外，必須進一步從大學入學制度設計著手，讓社區高中學生也有機會進入頂尖大學，提升非都會區社區高中的聲望。